

民國史論
中

呂芳上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這部書的主要內容彙聚了作者多年來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耕耘和看法，值得一述的幾個重點：一、注意辛亥革命史、五四運動史與北伐史的研究。二、1980年代，婦女史研究成為新興研究領域。三、1990年代之後，臺灣政局變動，學術生態因民主化、自由化而丕變，對民國史研究更充滿衝擊與挑戰。



民國史論 中

呂芳上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史論 三冊

作者◆呂芳上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韞英
責任編輯◆徐平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004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5-2201
營業部：10660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三號
電話：(02)2368-3616 傳真：(02)2368-3626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3 年 12 月
定價：新台幣 1500 元



ISBN 978-957-05-2895-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中冊）

叁、民初政局發展

第一章	辛亥革命百年：臺灣觀點	5
第二章	南洋僑界的卜式	5

——鄧澤如與辛亥革命（一九〇六～一九一六）

第三章	二次革命後國民黨孫、黃兩派的政治活動（一九一三～一九一七）	6
第四章	民初孫中山、宋慶齡的革命情誼	6
第五章	尋求新的革命策略	6

——國民黨廣州時期的發展（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第六章	廣東革命政府的關餘交涉（一九一八～一九二四）	7
第七章	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關係（一九一八～一九二二）	7

——由《蔣介石日記》的觀察

肆、抗戰前的中國

第一章 北伐前學運的動向（一九二〇～一九二七）

第二章 「學閥」乎？「黨化」乎？

——一九二五年的東南大學學潮

第三章 「竺震旦」與「驅象黨」

——一九二四年泰戈爾的訪華與東西文化之爭

第四章 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

第五章 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

——以蔣介石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的探討（一九二九～一九三六）

第六章 對訓政時期江西縣長的一些觀察（一九二六～一九四〇）

7	8	7
8	4	0
8	8	8
9	9	4
9	3	0
1	0	3
	4	4

叁、民初政局發展

第一章 辛亥革命百年：臺灣觀點

一、前言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締造了中華民國，終結中國數千年的帝制，對於東亞周邊各國，乃至於全球範圍，都有歷史性的影響。雖然無可諱言地是，中華民國曾遭逢許多嚴峻挑戰，而有一段坎坷的歷程；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的易手，尤屬晴天霹靂的變局。所幸中華民國仍舊守住她的最後一片土，臺澎金馬，屹立不搖至今。基於很多理由，辛亥革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事件。

然而，反思這樣一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不是容易的事情。當前的臺灣是一個開放社會；不同群體對特定歷史事件的解讀，亦已趨於多元。就此而言，談所謂辛亥革命的「臺灣觀點」，得從幾個角度切入，至少須含括：辛亥革命的歷史遺產、臺灣學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海峽兩岸觀點的異同，以及晚近研究所遭逢的挑戰。

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臺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諸般外貌，皆有可觀的變化，連帶牽引學界與社會大眾對於辛亥革命的看法。即使是同一位研究者，在歷經或目睹數十年來的劇變後，也不免

出現態度的轉移。例如，張朋園教授在其名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九六四年初版說：「我常常假設，如果他們（孫中山與梁啟超）的合作有成，救國的大業或不致因為力量分散而困難重重，辛亥革命說不定要提早幾年，民國初年的歷史也許隨之改觀。」¹事隔三十五年後，張朋園的看法有了變化，不再惋惜梁任公「放棄了革命」，同書之再版序一改前此，認為：「中國從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的處境水深火熱，吃盡了苦頭，沒有看見革命家許諾的幸福。這樣的感受，如果我要修改本書，恐怕會變成另一本書。」²張朋園有此感受，自非偶然，這正是我們可討論的議題。

在上一個世紀六〇年代，「革命」話語的餘溫未息，國民黨的革命史觀，基本上仍主導臺灣社會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看法；而彼岸的中國大陸亦以「文化大革命」為名，掀起滔天巨浪。受耳目所及之影響，若說當時知識界還未跳出「革命的時代」，似乎不誇張，但他們對相關議題已有深刻反省。³曾幾何時，一九八〇年代以降，「革命神聖」的光環開始褪色，加之國家認同問題的浮現，不免衝擊臺灣各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觀點。總的說來，臺灣社會對辛亥革命的感受，確實是與時俱變。最近，臺灣官方對辛亥革命一百年冷靜以對；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舉辦

1. 張朋園，〈自序〉，《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九年版），頁xvii。

2. 張朋園，〈再版序〉，《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vi。

3. 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韋慕庭先生序〉，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五年版），頁i。

活動，外界又普遍認為不易提高民間的熱度。何以致此？又應當如何面對呢？

值此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的盛會，這一回顧和反省，毋寧是有其必要的。何況，辛亥革命史，甚至相聯結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正是大家共同關切的主題，的確值得深入討論。

二、辛亥革命與歷史轉型

辛亥革命的「意義」為何？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永遠不會出現定論。不過，簡單討論其歷史影響，無疑是必須的，也有助於理解臺灣社會對相關問題的看法。特別是，這場革命意謂著政治轉型，而非僅是傳統歷史上的易代鼎革。國體既然出現變化，反映的是政治、社會、文化價值觀之轉化，而當中思想內容迄今仍影響海峽兩岸的社會。就此而言，早年教科書對辛亥革命的敘事模式，在今天已不能滿足多數讀者的眼光。這種敘事模式，專注於刻畫興中會、同盟會等一脈相承之革命團體，前仆後繼，犧牲奉獻，終於推翻了滿清惡政府。大無畏的革命英雄史詩，確乎令人動容，然而，在晚近的學界看來，辛亥革命亦是中國知識界長期思想蓄積的結果，當中既有革命黨人的信念、流血，也絕對少不了思想界弄潮兒、立憲派人物的啟發。抑且，革命成功後（「成功」與否，或仍有爭論），何以遲未兌現革命家對美好家國的許諾？針對這類問題的思考，確實不是傳統革命史典範所能勝任的。

歷史的過程多是累積與發展的，晚清較早的知識分子，如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等，從抨擊舊社會到介紹西方新知識，其後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章太炎、鄒容等，介紹新思想，從坐而言到起而行，在尋求「中國往那裏去？」所展示打破傳統，尋求「近代國家」的建國藍圖，實已揭櫫世界普遍價值與國家未來長遠的發展方向，而這正是辛亥革命意義之一。從思想史角度談，一八九五至一九二〇年前後的二十五年間，是張灝教授所形容的「轉型時代」。⁴清軍於甲午戰爭慘敗，但同時也觸發了中國內在求變動力的強化，思想與社會宛如蟬之脫殼而蛻變。其間，科舉制度遭到廢除，新式學堂不斷湧現，而相信無政府主義的年輕人從法國、日本學習到新的激進思想。國內的開明士紳如張謇、湯壽潛等人，也都接受新世界觀的影響。西風既已東漸，中國不能不適應挑戰，走向轉型。這種思想內容的變化，不是革命黨人所能獨力造成。在梁啟超《新民說》推波助瀾下，中國知識分子群起思考，如何化帝國臣民為現代國家之國民。在嚴復《天演論》譯本的刺激下，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救國族於危亡的壓力。⁵前揭思想內容的生產者、接受者，不一定是革命的贊同者。但是，傳統文化取向的危機、儒家宇宙觀的動搖，勢必會衝擊到既有的政治秩序，進而沖積出孕育政治轉

4. 參閱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〇）。

5.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論壇上，正瀰漫著「物競天擇」的話語。例如胡洪驊以「適」為名，又以「適之」為字，陳炯明以「競存」為字，都是這個道理。參見胡適，《胡適自傳》（合肥：黃山書社，一九八六），頁四七。

型的土壤。

革命派與立憲派都是催化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簡要言之，革命黨激烈，立憲派較溫和；惟革命之發生，與立憲運動有非比尋常的關係；而革命既已爆發，立憲運動乃中道而止，但依舊在革命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⁶由此觀之，辛亥革命的目標，除了革命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一類的「小民族主義」⁷訴求外，各方面的綜合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廢除專制政治，實行民主政治。一開始，這兩重任務的確是推進中國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的首要工作；同時，兩重任務之間有聯繫，但非一回事。⁸從歷史經驗看，建立了共和制度並不等於實行了民主政治。特別是，早期先知先覺者號召批判帝制、推翻專制王朝者多，討論廢集權、行民治之法者少。他們以為共和政府一經成立，民主政治乃水到渠成之事。事實上，共和國體之下也有專制政治出現的可能。一九一三年宋教仁之死，即已敲響民初政黨政治的喪鐘。⁹

6. 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之相關討論。

7. 「民族主義」是晚清政治運動的重要啟動力，但立憲派和革命派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並不相同。革命派在晚清宣揚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以漢人為主體的國家。革命派的激進者甚至主張誅殺所有滿人，以報明末清軍入關屠戮之仇。反之，立憲派謂，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應共同對抗外國侵略，是為「大民族主義」。並以此評斷革命派屬「小民族主義」。此點梁啟超早有說法，後人之進一步討論參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臺北：東華書局，一九八五），頁一九。

8. 茅家琦，〈中華民國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二〇〇四年期一，頁六五至七二。

9. 有關民初政黨移植的討論，參閱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五）。

某種意義上，辛亥革命確實奠定了民主的價值觀、以及共和的國體。不幸的是，作為政治轉型的階段，民主政治試驗被具有現代性的集權主義者袁世凱擊垮。¹⁰接著南北分裂，文人、武人各挾國會、黨派作政治權力分贓的纏鬥，民主淪為政爭手段。這是西方政黨政治移植的第一次挫折，也是由帝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首次失敗。尋解中國政治困局的仙丹妙藥，國民黨、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代均向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取經，都得到列寧式政黨組織的秘方。而政治動員型的革命會導致黨治國家（party-state）興起，在蘇聯如此，在中國亦然。¹¹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宣布實行訓政，中國政治轉入了「黨國」體制，這是近代中國政治由政黨政治轉型的第二階段。

國民黨在民初議會政治夭折後，重新定位為革命黨，連結了一九二〇年代的一黨建國、以黨治國，中國進入黨國體制的時期。民國的黨國體制，政治結構以西（英美式民主）為體，以俄（列寧式政黨）為用。作為民國政治的新發展方向，一九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的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其歷史意義為何，在此無法詳談。¹²可以略微提出的是，新政治體制對意識型態統一、型塑

¹⁰ Ernest P. Young,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asks for a New World", in Merle Goldman and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3-210.

¹¹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62-265.

¹² 參見本書〈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與省思〉一文。

革命歷史記憶的重視。一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執政後，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黨化教育」，內容主要是「總理遺教」（一九四〇年，始由國民黨通令全國改稱「國父」）、國民黨黨義、國民黨之革命史等。就革命史而言，不免貶抑滿清政府，淡化立憲派的地位，強調革命黨的事功。以梁啟超為例，國民黨的宣傳機器長期視如寇讎。直至一九四〇年代，蔣介石才重新認識梁啟超的思想，予以肯定，並促成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二年明令褒揚之。¹³即令如此，在官方革命史譜系中，立憲派的地位仍舊不高。相關情況，對稍後將討論的臺灣之辛亥革命史研究，尤有可觀影響。

三、臺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一九四九年以前，參與革命的國民黨人馮自由¹⁴、鄒魯¹⁵等，對辛亥革命的回憶文字或撰述論

13. 有關蔣介石對梁啟超的認識，因《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而格外清晰。參見黃克武，〈蔣介石與梁啟超〉，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二一至一三八。

14. 例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五）。臺灣學者一般使用的是，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之臺版。馮自由具國民黨「西山會議派」背景，抱持堅定反共立場，故長期受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型態的漠視。有意思的是，近來中國大陸出版社重印了馮自由著作，封面更煞有其事地以蔣介石落款題名，似乎顯示近代史論述風向球的若干轉移。見《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15. 例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八）；《中國國民黨史略》（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五）。

著，本其革命黨正統立場，對日後的臺灣近現代史學界影響不小。及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政治情勢的劇變，當然影響了社會、文化等等層面。在冷戰局面下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臺灣，反共國策是歷史教育的重心所在，中國現代史則以中華民國史為主幹，又以國民革命運動的全部歷程為範圍。其結果自然是，強化一九二〇至四〇年代即已成形的革命史書寫，傾向於述說滿清的腐敗，諷刺北洋政府的無能，貶抑共產黨的地位。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等同於國民革命史，國民革命史又等同於國民黨史，國民革命史觀便成了臺灣官方的近代史論述主軸。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初，亦即一九五〇年代，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臺灣確實還不具備客觀討論辛亥革命史的充分條件。不過，前述氛圍並未真正阻礙史料積累準備。這時的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是由史政機關和大學歷史系所帶動，不論大學教授或史政機構的主持人，多以大陸遷臺學人為主。臺灣的近代史研究，自然便與四九年之前中國史學相接榫。戰前中國史學界有所謂「史觀派」與「史料派」之對壘，¹⁶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因為獨尊馬克思主義，史觀派在中國大陸掛帥，但史料派則在臺灣有了傳承。

一九二〇、三〇年代重視史料的學者，胡適、蔣廷黻、傅斯年、羅家倫，乃至於郭廷以，他

16. 汪榮祖，〈後現代思潮下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五六（臺北，二〇〇七年六月），頁一四五至一五一。

們後來出掌臺灣學術及史政機構，相當程度影響了臺灣近代史學研究的走向。例如一九五〇年代身兼國史館館長、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的羅家倫，在全面修史條件尚未齊備的情形下，已致力於史料的蒐集、整理工作。一九五三年起，黨史會編印《革命文獻》史料集，數十年來累積了百餘輯，前五輯即為涵蓋該黨在興中會、同盟會、辛亥革命、中華革命黨階段的重要資料（此後仍陸續有新刊布）。¹⁷這套史料集內容豐富，對臺灣學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深刻影響。這一時期在大學中任教的吳相湘、沈雲龍、李守孔等前輩學者，的確也為辛亥革命與民國史研究打下了基礎。當然，重視「考史」甚於「著史」的作風，不獨存在於黨史會，也存在於另一近代史研究的重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研院近史所於一九五五年二月開始籌備，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方正式成所。此間郭廷以是主幹人物，郭是羅家倫中央大學的學生，師承羅氏，重視史料，長於年代學，重視近代重大史實的發掘，不強調理論但提示關鍵問題。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適返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是主張考史而不著史的人，因此對近代史研究和近史所的研究工作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倡導寫回憶錄，助成近史所口述歷史的推動，目的還是在保留史料。自一九五五年以降，近史所還陸續獲得

17.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一至四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九五三—一九六三）。其後由黃季陸、秦孝儀接續主編。當中，秦孝儀主編的六四至六七輯（一九七〇年代出版），亦為辛亥革命的相關史料。黨史會在臺灣民國史研究的走向，參見蔣永敬，《浮生憶往》（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二〇〇二）；李雲漢，《史學圈裡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發行，一九九六）。